

一方翠竹耀古今——义乌竹文化探究



马头墙下的竹



绣湖公园内,市民隐于竹下休闲娱乐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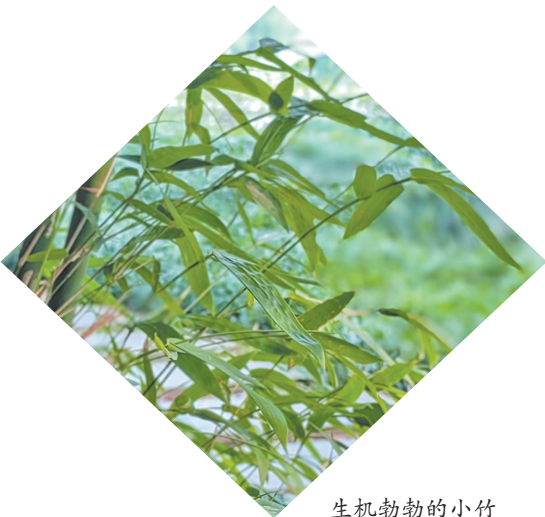
近日,全国各地掀起一股竹文化热潮;中国西南地区最大的竹文化博物馆——宜宾竹文化博物馆正式开馆;2024柯桥时尚周(春季)的启幕秀以竹文化为灵感,掀起了绿色新时尚……

我国是世界上研究、培育和利用竹子最早的国家,被誉为“竹子文明的国度”。竹子历来为人民所喜爱,有“梅兰竹菊”四君子之一、“松竹梅”岁寒三友之一等美称。竹文化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,深深影响着中国人对真善美的认知和追求。

据史料记载:义乌自古产竹,竹文化历史悠久。日前,义乌地方志资深专家傅健先生搜集资料,创作《义乌竹文化》一文,历数从新石器时期至民国时期义乌竹文化发展变化,内容详实,考证严谨。

6月16日,记者在走访中发现,竹文化已深深扎根于乌伤大地。徜徉于绣湖公园、骆宾王公园等地,鹤发垂髫搬桌移凳隐于竹下,休闲娱乐两相宜;驱车至大陈、苏溪等乡间,漫山翠竹掩映山涧,游人戏水、嬉闹流连忘返;而分布在各处的何福礼竹编工艺制品展览,更吸引中外游人驻足观赏、赞叹。

会稽箭竹曾美冠东南



生机勃勃的小竹

籊(篠:小竹;簕:大竹)、齿革、羽毛。”也就是说,小竹和大竹即是当时的贡物。

先秦时期,义乌一带的万亩竹林被广泛用于制作弓矢,消耗量巨大。吴越争霸时期,越王勾践曾蛰居大陈镇句乘山。为了完成复国大业,陶朱公范蠡十分重视战略物资的生产和储备。义乌所产之竹因品质优良,被称为“箭竹”。“会稽之箭,东南之美。古人嘉之,因以命矢。”晋人戴凯之所著《竹谱》“七贡”详言此事,曰:“箭竹,高者不过一丈,节间三尺,坚劲中矢。江南诸山皆有之,会稽所生最精好。”又曰:“大抵中矢者虽多,此箭为最,古人美之以首。”

苏溪一带亦盛产竹子,有“十里竹海”之称。古志记载“箭山:县东北四十里,高三十丈,青潭山之东,横亘山源之口。山多竹箭,故名。”

嘉靖三十八年(1559年)9月,名将戚继光往义乌招兵。经过选拔,有4000多义乌人人选。后来,戚继光又相继两次到义乌招兵,每次各1万人,共招了大约2.6万人。

据《大中华浙江省地理志》“义乌县”记载:戚继光曾利用苏溪丰富的竹子资源和封闭、偏僻的地理条件,在清潭山仙顶一带加工狼筥,训练义乌兵走演鸳鸯阵,“箭竹产青潭山,戚继光义乌军,昔年射击之利器也。”经过严格训练,以义乌兵为主体的戚家军,成为中国历史上很能打的一支队伍。自成军起,转战浙江、南直隶、福建、广东,大小数百战,从未有败绩。万历时,甚至跨过鸭绿江出征朝鲜,打击日本丰臣秀吉侵略,保卫了大明北疆的安全。

义乌文人常以竹自喻

古往今来,青青翠竹吸引了无数文人墨客。因其空心、挺直、四季常青等特性,象征着虚而有节、挺拔凌云、刚直坚韧的操守和特质。《义乌竹文化》中考证,义乌文人爱竹,常以竹自喻,自古皆然。

三国时期,乌伤县令褚瑶,人品高洁。据嘉庆《义乌县志》卷八“官师·褚瑶”记载,“罢去,单船而归。太子庶子羊道,乞其土宜,瑶以竹一竿与之,曰:‘东南之美,唯竹箭最贞,幸堪岁寒。’道密令人视其舟,惟竹笠一枚、草浚数颌而已。遂起用为明信中郎。”褚瑶清廉正气,被传为千古佳话。嘉靖时的义乌知县方介亦然,“公每按部,不受民馈食,一竹箬自随。”

义乌人徐侨在诗《竹门》中,以竹为喻,阐释自己的清廉处世之道。“闭以谢俗客,开以纳嘉宾。”当有人向他来求财、求官和求学时,借机表达自己的主张,“或方计财利,我方甘饕贫;或方图宦达,我方埋隐沦”“义理滋我悦,诗书陶我真”。诗文末

尾再次言明:只有守住了底线,才能“初心苟无负,斯不愧斯门”。

傅健大赞《竹门》:“这是一首清晰、准确反映徐侨的人生观、世界观的好诗,具有重要的史料和文献价值。”

“地偏境自佳,烟云绕孤屋;寒声渺疏松,翠影澹修竹。”出自义乌人喻良能的《题圆通寺至乐亭次待制王公韵》一诗。

骆宾王多次即景作诗,以竹言情。在《晚泊河曲》中,书:“三秋倦行役,千里泛归潮;通波竹箭水,轻舸木兰桡。”在《艳情代郭氏答卢照邻》中,书:“倒提新缣成慊慊,翻将故剑作平平;离前吉梦成兰兆,别后啼痕上竹生。”

理学大师朱一新赠源远大兄的洒金笺楹联,“因竹为宇,无事作室;有兰可群,其间可觞”。因活用了王羲之《兰亭集序》中“因竹为亭”“无事作室”“有兰得群”“其间可觞”的佳句,广受赞誉。

“水竹洞天”诗会成就颇高

“宁可食无肉,不可居无竹”。义乌文人也爱在屋舍周边种竹,或以竹送友,或广邀名士吟诗作赋。傅健翻阅义乌典籍,列举了不少流传下来的美谈。

倪仁吉平生爱竹,在义乌大元村的香草园栽种了一丛苍翠的方竹。王士禛《池北偶谈》卷十一之“倪仁吉”篇记载:莱阳处士董樵游学金华时,曾慕名前来拜谒倪仁吉。文人相重,意气相投,倪仁吉敬慕董樵的人品才学,砍下一枝方竹赠送,成为文坛的一段佳话。

德胜岩之上岩洞在义乌市西北二十五里,绸岩之北,山腰有石岩,中为室,深数丈,广如之。黄潛有《上岩寺访一公》诗云:晓色微茫尚带星,修溪萃确断人行。独支瘦竹身犹健,高入重云地忽平。落月正当山缺处,细泉频作雨来声。上方灯火青林曲,隐隐疏钟一再鸣。

据记载,明嘉靖中,邑人朱鸿即上岩洞西稍前,筑厅舍三间,为子弟肄讲之所面,植修竹千竿,四时清赏。万历中,知县俞士章为邑人致政,大尹陈守亮筑楼房三楹,时往游眺,相与论文,或信宿而返。

元末明初的胡宅村人胡伯器,在家乡苏溪讲岩山旁,精选清凉之地,起屋建亭。苏伯衡在《名亭辩》一文中有言:“旁植美竹,浮光静影,上下映带,不知尘寰之接壤也,因名其亭曰:水竹洞天。”

而后,胡伯器遍邀名士,优游其中,吟诗作赋,俨然

是追慕古风的文人雅集大诗会。宋濂在《水竹洞天记》记载了当时盛况:今子之居斯亭,当风日澄煦,月色爽朗,良宵嘉旦,呼酒命席,朋游毕集,披羽衣,御五弦,鼓淇澳之章,诵寒潭之句,更歌迭舞,扬袂抚掌,有不知之西颢,零露之在草也。当是之时,神酣意适,虽清都蓬岛,何以加此,而谓之洞天,奚为而弗宜哉。

留存至今的诗文,皆由当时名流高士所作,文学成就很高。据崇祯《义乌县志》卷十九之“遗事”记载:“水竹洞天:国初胡伯器结亭苏溪之滨,与诗人游宴赋诗,其诗数十首,都无俗韵,盖吴郡陆伯恺、广信陈修、番阳程国儒诸子作也。宋承旨文为之记。”

《义乌竹文化》一文集康熙《义乌县志》卷十六之“古迹”中所载四首《水竹洞天》。细品得见,在不同的文人笔下,竹林美景似相闻,志趣各不同。

许谦之高第,“柏轩人”范干言:苏溪溪上亭还好,水竹清幽胜倍加;万个修篁领风月,一泓寒玉浸烟霞。尝学文章于黄潛的刘涓曰:山色遥观翠万重,泉声近听与琴同;洞天水竹殊清绝,烟岛云林入望中。而文人马抑则言:石上修篁谷口云,翠旌玉节下茆君;有时和得钧天曲,不许寻常过客闻……“这时的‘水竹洞天’雅聚,已是一次文化的盛会,对后世影响深远,也奠定了苏溪在义乌古代文化史上的地位。”傅健如是说。



义乌江上的竹筏(资料图)

竹排运输曾是一门技艺

研究证明,我国商代已知道竹子的各种用途,其中之一就是用作竹筒,即把字写在竹片(有时用木片)上,再把它们用绳子串在一起就成了“书”。汉字“册”,即由此而来。

春秋战国时代,竹器制作已成为当时社会的一个重要生产部门——竹器手工业。竹器制品在当时广大民众生活中,成为“养生送死”不可缺少的物品。汉代有竹器生活物品60余种,晋代有100多种,唐宋时近200种,到明清时期达250余种。

在没有塑胶的时代,竹子也是义乌人民最好的生产原材料之一。古时义乌人掌握的竹编技术,几乎涵盖了从房子到家具用具的所有一切,使经济条件一般的普通老百姓,可以用上便宜而实用的生活用具,过上较为便利的生活。梁代傅翕《善慧大士语录》记载:“(傅大士)与里人渔,每得鱼,常以竹笼盛之,沉深水中。”

据古志记载:义乌出产的竹子品种较多,产量也较大。嘉庆《义乌县志》卷十九之“土物·竹之属”记载:竹之属:箬竹、雷竹、筋竹、淡竹、斑竹、紫竹、慈竹、水竹、毛竹、方竹、凤尾竹、箭竹、石竹、笋。

至民国时期,如何运输竹子和利用竹子运输货物,在当时也成为了一门专业的技艺。竹筏运输,亦称竹排,用毛竹制作串拼而成。竹筏有前后两节,或三节、四节,前节头部向上仰翘,以减小行船阻力。历史上竹筏为境内重要的水运工具之一。

在旧时,义乌市稠城镇销售之木材、木柴、毛竹,向

来依靠外地客商消化。春夏水涨时,产地将木柴、木材、毛竹分别用竹索编制成筏,从山谷顺山洪冲流到大溪或江道,然后由筏工沿义乌江上溯可至东阳县的歌山、巍山,或顺流来义乌。

傅健介绍,这种自流放运方式虽有一定的风险性,然而省力省工,按当时条件,是很适宜的。由于自流运输须视水位而定,季节性很强,一般每年有三次高潮:谷雨水(俗称初潮)、端午水(俗称大潮)、七月水(俗称末潮)。

民国21年(1932年),全县有竹筏1000余对。每对竹筏计2.5吨位。主要通航在佛堂上游水域,沿义乌江干流可达东阳县巍山,沿南江可达东阳县南马。“(佛堂)交通方面:水道循婺江南达金华、兰溪,可航帆船;北通东阳江,折东阳南江,坐竹筏可抵东阳横店;自东阳北江可达东阳巍山,因水道淤塞,深浅不一,仅与县城间(距义乌县城五华里之西江桥)每日对开航船二次,再往上游,仅可航竹筏。义乌、东阳两县土产及商品大都借此水道运输。”(据1949年12月,中共义乌县委《义乌县佛堂镇农村调查》)。

近年来,随着生态文明理念的深入人心,竹林景观、竹乡民俗、竹文创产品不断推陈出新,赋予义乌竹文化以新内涵。目前,我市竹林面积4.6万亩,建立了毛竹、食用笋“菜篮子基地”近万亩,涌现了一批食用笋竹专业户、专业村,平均亩产值近5000元。竹笋产业已经成为全市山区农业经济的一大支柱产业。

全媒体记者 左翠玉 文/图



大陈镇的竹海 胡木水 摄